

□ 母校纪事

听到这个话题脑袋就嗡嗡在响。

后来和林老师在学校里有过几次碰面的机会，每次都想上前去和他承认我就是那个打架的学生，但都没有这个勇气。但我着实改善了和八食堂师傅的关系。和大师傅好马上就有个直接的益处，就是碗里的菜经常会比其他同学多一点点。有个西区的女同学来八食堂吃饭，看着我打的满满的一大碗溜肝尖说：“你们八食堂给的可真多！”

毕业后90年代的某年校庆，我终于也

像老校友一样胸前别上小红条，上面写着姓名、年级参加校庆。正好在大礼堂前面的草坪边上碰到也佩戴校友红条的林老师。时代变了，我们都已经没有了蓝棉袄和军便服，都是西装笔挺。这次我不怕了，鼓足勇气准备和林老师好好聊一聊大礼堂他的讲话，十多年心里的石头好有个着落。我满心歉意地准备听到林老师的批评，林老师很礼貌地听完我的描述，但他告诉我：他不记得这次打架事件了。

难忘师恩

○ 陈云昌（1968届工物）



陈云昌学长

一百多年来，一大批大师级的科学家、教育家云集清华。到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上学的时候，学校几经变迁，已经成为工科大学，教师也不评定职称，但我们知

道，清华曾拥有教授、副教授108人，称之为“108将”。

在清华接受老师们的教育是我们终身的幸事，他们严谨治学，春风化雨，我在校六年多，上课虽只有三年多，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大学第一学期开设高等数学课，我们工物系和数学力学系一起开的大课，授课老师是李欧先生。李先生身材魁伟，声音洪亮，他步入教室把教案放在教桌上从不打开，直接就切入正题，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住。他的板书非常工整，粉笔字写得非常快但又非常娟秀，便于大家记笔记。在讲课中，他一般不讲如何解题，而是注重数学的基本概念及各种数学公式和方程式的推导。在每堂课结束时，都有非常精彩简炼的概括和总结，当他最后一句话讲完，下课铃声刚好响起。把高等数学这样的课程讲授得如此精彩，让我们佩服得五

体投地。

有一年，同学们参加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选活动，当公布选举结果时，在正式候选人之外，李先生还得了几票。后来了解到，李先生燕京大学毕业，他在清华曾被评为教授，是数学教研室主任，还是学校教师工会的副主席。但他在“反右”时成为右派分子，虽然已经摘了帽，但职称从教授降为副教授，从主任降为副主任，好在能够给学生们上课了。我们这些年轻学子，对这些背后的故事没有直接的感受，但对于李先生的讲课水平，李先生的讲课风采，却铭记在心，至今回忆起清华的教师都会想起李欧先生。

从大一第二学期起开设普通物理课，由刘绍唐教授主讲，据说他在老清华教授中是唯一的“土教授”，就是说他没有留洋的经历。刘先生讲课时笑容可掬、满面红光，操着一口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普通话。刘先生讲课有时夹杂有英语或者不标准的俄语，他说，俄语是苏联专家到学校后跟着俄语扫盲班突击学的。刘先生讲课内容非常宽广，基本概念讲得透彻明了。他讲课没有教材，但他总是指导我们如何阅读参考书，而且他指的参考书变化多端。他对于记听课笔记要求很高，要求在上课时记听课笔记，课后阅读参考书记阅读笔记，最后再进行笔记整理，因此我们的普通物理课程学得很扎实。

物理实验课在科学馆进行，我平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那里学会的。每次实验课前，都要预先写好实验预习报告，经老师看过后开始做实验，一般进行得很顺利。有一次，记得好像是“密立根油滴实验”，数据总是不对，但不知道是什么

原因。已经忘记姓名的那位年轻老师，非常耐心地同我一起重新做实验，数据仍然不对。最后，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努力，终于找到了原因。那时，十分陈旧的科学馆已经没有其他人了，实验室空荡荡的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显得有点阴森恐怖。外面天已黑透，学生食堂已经关门，只能到八号楼买一点食物充饥。我想，那位年轻老师应该还是单身吧，他上哪里吃晚饭呢？经过这五个多小时我似乎明白了，什么是科学实验，什么是科学精神。清华老师就是这样教我如何为学。

余兴坤是工物系党总支书记兼系副主任，在延庆“四清”时他是延庆城关“四清”分团的党委书记。1966年上半年，我在分团办公室任秘书，几乎每天可以见到他，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十分清瘦，个子不高，不太爱讲话，但在大会上讲话时不急不徐，解释政策非常清楚，分析形势十分准确，没有任何废话。每个月，学校、系里都通过机要给他寄来厚厚的材料，后来他告诉我，这是我们905专业科研攻关的情况报告。在“四清”生活艰苦、工作繁忙的情况下，他作为905专业科研的负责人和带头人，还在毫不放松地履行着他的职责。

有时他会走到我的办公室，及至我看到他站起来打招呼，问他有什么事时，他往往说，没有事，你忙你的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文革开始，我们还在“四清”前线，在还没有接到返校命令时他曾回了一次学校，一些同志围着他询问学校的情况，他几乎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但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：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！”

□ 母校纪事

何东昌时任校党委副书记，兼任校教务处处长、工程物理系主任。在学校期间，我们作为他的学生，虽然没有直接听他讲过课，但在我们的心目中，他是我们真正的老师，我们都以是他的学生而自豪。在学校的大会上，我们经常能听到何东昌的报告，他讲话言简意赅、深入浅出、充满哲理，报告时间一般在一个半小时之内，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。1965年上半年，刚分完专业不久的一天，我们几个同学在工物系馆门前课间休息，只见何东昌骑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来到系馆，他向同学们含笑点头后匆匆上了系馆的台阶，看到系馆大门旁一个被丢弃的阶梯教室座椅的部件，他立即捡起来，很认真地向工作人员做了交待。

当时我们就知道，何东昌是解放前学校航空系的年轻教师，是解放前夕清华地下党的负责人。在陈赓大将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，点名要何东昌出任哈军工负责教学的副校长；创办北京航空学院时，中央要调他去担任领导，但都由于创办工程物理系的需要、蒋南翔的努力争取，何东昌得以留在清华。

蔡君馥是我同学的姨妈，当时是清华最年轻的副教授，土建系建筑物理教研室主任，后来我同学成了我的夫人，蔡君馥先生也就成了我的姨妈，因此对她了解和认识就更多、更详细一些。蔡先生解放初在天津耀华中学校高中毕业，因对抗家庭的包办婚姻，只身考取清华，引起家庭登报脱离关系。她1957年作为梁思成先生的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，1959年取得“薄壳结构理论研究”科研成果，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，当时各大报纸还曾给予报道，并应邀出席国庆十周年宴会。

在文革前最后一次职称评定时被评为副教授，时年不到35岁，是清华“108将”中最年轻的成员。

接受她的教益主要是在我们毕业离校以后。上世纪80年代末她年近60，曾去河南、山西等地考察中国特色建筑窑洞，还曾受邀赴美国讲学一年，美方给她很高的讲课费，但她为了方便和省钱，退掉了美国大学给她租的住房，与留学生合租住房，骑自行车去讲课。回国时什么美国货都没带，把所有剩余的钱上交中国大使馆。

她退休后跟我们交流当时的工资，她竟然比我少！她告诉我一个“秘密”：她当年参加那个挂名第一的科研成果时，实际上刚研究生毕业，才参加项目两年，而别人已经干了多年，有了重要进展。但是成了右派后，组织上就决定了让她排第一，怎么推辞都不行。后来她成了系里的领导说话能够起作用时，就两次主动把提升工资的机会给了这位老师。她说即使这样，那个老师的收入才刚刚和她差不多。清华教师就是这样教我如何为人的。

在校时，我曾担任校学生会群众体育组副组长，有机会参加学生会干部会议，有幸近距离接触到负责学生会工作的校团委副书记谭浩强。他脸色白净、清瘦，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。大家在讨论发言时，他就在本子上不停地记着什么，我瞥了一下他的笔记本，是他信手涂鸦的“作品”。等到他总结发言时，把大家发言的精彩部分都归纳得条理清晰，把以后的工作如何开展讲得头头是道。我心想，这个人真是绝顶聪明，名不虚传，顿生敬意。